

日常的叙事与世事杂谈：

以雷曼的《叙述经验——叙事的文化学意识分析》为中心

法桥 量

HOKKYO Hakaru

翻译：施尧

序言

从1970年代起，日常这一概念逐渐作为德国民俗学的关键概念占据学术讨论的中心，与此同时，叙事研究也开拓出了被称为“日常的叙事”的崭新研究领域。“日常的叙事”在日本多被看作为“世事杂谈（世間話）”，而在德国，它是和传统的体裁研究相并行的研究方向，学者们讨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实际都叙述什么，以及这种叙述是否可以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其中，阿尔弗雷德·雷曼主要以生活史为中心深化了“日常的叙事”研究。

本文首先将粗略地梳理由鲍辛格提出的“日常的叙事”在民俗学的叙事研究中的发展，随后将介绍把“日常的叙事”研究转变为“叙事的日常”研究，并发展成为意识分析研究的雷曼的叙事研究的框架，以其最新理论著作《叙述经验》（2006）中所展示的理论体系为中心，探讨作为“日常的叙事”研究的日常学的可能性。

1 作为叙事研究对象的“日常的叙事”

“日常的叙事（Alltägliches Erzählen）”这一概念由赫尔曼·鲍辛格引入了民俗学研究，作为民众诗（Volkspoesie）的反命题重新发现了叙事。这也与战后德国民俗学从古代学转变为日常学的潮流相呼应。

根据鲍辛格的定义，“日常的叙事”是“对照性、补充性的概念，是以往的民俗学采集及研究活动所形成的民间故事（Volkserzählung）这一术语所无法覆盖的领域。作为一个有着体裁化征兆的别的叙事，与传统的形式或体裁相对峙。更多地出现在传承故事稀薄化的地方”（Bausinger 1958=1994:177，译文有改动）。

《儿童和家庭的童话》后，格林兄弟的民间故事分类——即故事（Märchen）、传说（Sage）、再加上之后的笑话（Schwank）三个体裁成为德国的民间故事（口承文艺）研究的中心。其中，尤以故事因最能体现民众诗（Volkspoesie）的特性而被看做是口承文艺的代表性体裁（ebd.:169）。但是，那种仿佛由浪漫主义画家描绘的，19世纪时人们聚集在纺纱小屋（Spinnstube），在幽暗的灯光下听着故事、传说¹、笑话的“叙事共同体（Erzählgemeinschaft）”，在20世纪已经几乎不见了踪影。所以传统体裁的叙事，作为活生生的叙事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Uffer 1983:21）。

在传承的叙事逐渐消失之中，赫尔曼·鲍辛格在调查了德国南部的士瓦本地区的农村后，完成

了他的博士论文《活着的叙事：基于对东北士瓦本民间故事生命的调查研究》（1952）。文中，他发现了很多不同于以往那些代表性体裁（如故事、传说、笑话、圣者传（*Legende*）等）的叙事体裁。如果把故事或传说看作盛装，那么在人们在日常叙述的事情就是常服，鲍辛格后来把它们统称为“日常的叙事（*Alltägliches Erzählen*）”。

鲍辛格将他的“日常的叙事”论以刊头论文的形式发表于1958年创刊的国际口承文艺杂志《*Fabula*》的创刊号上。这篇论文的问世犹如在传统体裁研究的湖水中砸入了一颗巨石，宣示了开辟出了一片现代叙事研究的新天地。鲍辛格认为：在现代，传统体裁的叙事的衰退过程，源于故事得以存立的条件即“狭小的话者视野”正在消失，幻想的世界正在被排除（*Bausinger 1958=1994:152*）。相同的观点也见于他随后出版的《科学技术世界中的民俗》（1961）中，书中强调：民俗世界的变化起因于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的“地平线*Horizont*”的扩张。也就是说，原本具有相对自律性的农村共同体随着和外部世界的交流越来越活跃，农村共同体的现实世界受到了外部世界的侵蚀，故事所形成的幻想世界的领域也遭到了威胁。

2 从日常的叙事到叙事的日常

姑且不论在现代，故事（*Märchen*）这种虚构的体裁失去生命力是没有办法的事，在此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不管是一直以来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农村社会或都市居民，还是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在日常中到底都叙述、说了些什么呢？

在鲍辛格提出“日常的叙事”之前，民间故事研究者们尽管没有正面探讨，但也已经发现了和传统体裁不同的“其他叙事”的存在。在一些考察同时代的叙事的日常的研究中，如*Mathias Zender*发现“旅行经历”或“军队时代的事”，*Alfred Cammann*发现“前线的事”，在匈牙利做调查的*Linda Dégh*发现“真实发生过的事”等在同时代的杂谈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中，*Otto Brinkmann*做了一个独特的试验，他让自己作为局内人参与了日常的叙事的场合，并记录下了真实的交流的场景²（*Bausinger 1977:324*）。此外，在1980年后，前东德民俗学家*Siegfried Neumann*积极地将被*Brinkmann*等故事采集者排除的实际经历的叙事，特别是占了日常话题很大一部分的“工作”的叙事纳入研究之中。

在日常交流中，我们经常会谈论到“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不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占据了生活世界的大部分。因此，工作常常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事。在日本，工作结束后人们会和同事一起在居酒屋，或者在家里讲述“工作”的事情，这正构成了“叙事的日常”的一个场景。

*Neumann*接受了鲍辛格提出的研究“日常的叙事”的提议，他把有关工作的叙事作为日常的叙事之一纳入了民俗学的故事研究之中。人们在各种场合叙述工作的经验或职场发生的事情，不单是信息的交换或“汇报”，而是积极地将自身的经历以故事的形式传达给听者，即带有“叙事”的意味。当然，人们不会将长期的劳动生活中的各种经历全部如数吐露，而是选择一些值得叙述的经历，在日常的多数情境下自发地进行叙述。*Neumann*认为，这种在记忆的池子里挑出来进行叙述的“有关工作的回忆（*Arbeitserinnerung*）”可以作为民俗学的故事研究进行探讨。他从同时代的日常的叙事中试图探索出与传统体裁不同的叙事。

的确，无论是*Brinkmann*做的叙事场合的民族志式实验，还是*Neumann*对工作话题的探讨，都对与“传承世界”相对立的“日常”这一新次元中的叙事做了很好的事例说明，对理解“叙事的日常”是一次很好地尝试。但是，他们都试图在传统的体裁体系中加入新的体裁，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还在传统体裁体系的内部，就仍然身处于传统民间故事学的延长线上。

那么,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到底叙述了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对谁,怎样叙述?“叙述”本身在日常中又具有怎样的意义?解答这些问题才是真正对“叙述的日常”的探究³。

然而,在以往那种重视文本的口承文艺研究看来,日常的叙事不属于那种由优秀的话者通过巧妙的语言叙述的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纯粹”的民间故事,同时就方法论上而言,面对无数个人叙述的无数经历,若想按传统的体裁对此进行收集和分析,再总结出某种共通的形式或功能,最后得出一个文化学或社会学的结论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就在故事研究者的踌躇之间,1970年代后期,阿尔弗雷德·雷曼开始积极地投入日常的叙事的研究之中,特别是根据亲身经历的叙事。他在博士论文完成劳动者村落的民族志后,主持了一些广泛收集汉堡市劳动者生活史的项目,并取得了大量的定性和定量资料,以此为基础,他发表了《日常中自我经历的叙事》一文,将其理论进一步进行了深化⁴。

3 从日常的叙事的功能到意识分析

但是,雷曼的立足点与鲍辛格以及做“工作话题”事例研究的Neumann都不一样。鲍辛格关注日常的叙事之于传统体裁的功能等价性以及向传统体裁的转移,而Neumann通过归类于Memorat这种单纯形式而与传统的体裁论相对接。与此不同,雷曼重视的是别的方面。“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现代的叙事作为从日常中抽取出的亲身经历或观察,对于话者和听者有着怎样的一些功能。同时,我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交流的手段,什么样的自传(Autobiographie),什么样的信件,什么样的对话,什么样的叙述,都和传承(Tradition)的东西一样,是由个人的方式所形成的,同时这些诸多形式也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也遵循着它们之间固有的形式法则”(Lehmann 1978:199)。

雷曼重视的“叙事”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人们的叙述是为了什么,想让谁听,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叙述才能最为有效地将心意传达给听者?重要的是每个人在叙述时的形式规则。话者想要叙述的欲望也可以说是想将心意准确地传达给听者的欲望。但是,话者若想将心意准确地传达给听者,则必须要采用和听者共有的叙述形式。雷曼所说的“功能”指的就是特定形式的叙述所具有的,在话者和听者的关系性中,对于话者和听者的意义。对话者而言,叙述一件事情有时是为了自我彰显,有时是为了得到放松,或者有时只是单纯地想取悦听者,而这往往被与听者的关系性所左右。这种叙述都具有一定的形式,也正是因为这种形式的存在,分析者才能够辨认出一定的功能。

不管口才如何,我们在日常的杂谈中经常谈论自己最近的经历或者回顾自己的半生叙述过去的经验。另外,在交换这种经验的时候,话者和听者的角色总是不停地交替,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日常的叙事的场合,这种话者和听者不停交替的交流方式正是“日常的叙事”的特征。雷曼强调,在叙事的场合,社会关系不仅仅决定了叙事的角色,也影响着叙事的内容。确实,很少有人会和素不相识的人吐露自己本真的价值观,随着和谈话对方的亲密程度的不同,叙事的内容自然也会不同。另外,在叙事的场合,当话者和听者有社会地位的差别时,或者根据异性或同性的区别,年龄差,是否是伴随着饮食的场所等不同的场合,无论是否有意为之,叙述的方式和内容都会一次次发生改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亲身经历过的。这也适用于民俗学中调查者和信息提供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作为现代研究的“日常的叙事”,雷曼要揭示的不是超越时代的“叙事的根本规则”,而是在现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的叙事,即影响交流过程的社会动态中的叙事(Lehmann 1978:200)。

把讲述自身经验的叙事放入交流的过程中分析,便能发现一些叙事具有不同功能。雷曼举出了“个别化功能(Individualisierende Funktion)”,“连带化功能(Solidarisierende Funktion)”“镇痛功能(Sedative Funktion)”(ebd.:212ff.)。之后他又加上了“正当化的话

(Rechtfertigungsgeschichte)”这一叙事类型(Lehmann 1980)。下面我们来看一则具有“个别化功能”的叙事的具体事例。

【事例1】

“从明天起你就要去实习了”父亲这么说道。我问：“去哪？”。他回答说：“去W”。那是一个离家15公里远的地方。“爸爸你为什么这么说？”“已经是决定好的事情了”父亲回答。

那之后过了7、8年，我才终于理解了父亲的用意。

我们当时在俄罗斯。晚上睡在一个大房间里。那个房间里挤满了士兵。我们也紧挨着睡在一旁。没法安稳入睡，只能简单地休息一下。因为在我的三列前有人发出巨大的鼾声，我发出一声抱怨的牢骚。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噢，我记得你的声音哦”。我一看前面的人，真是吓了一跳。那是我父亲的朋友，我们有4年没见了。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了当年他、父亲和工头一起下了赌注看我会不会去实习的事情。结果他赌输了，因为我去实习了。

真是莫个奇妙的事，这种事谁都没有经历过吧，都可以上电视了。(55岁，精密机械工人)(Lehmann 1978:207)

这段叙事是移居到俄国的话者在讲述偶遇几年未见的父亲友人时的情形。这种想要叙述只属于自己的经验的愿望谁都会有。将仅有一次的独特体验讲述给他人听，源自于想让自己区别于他人或进行差异化的欲求。

接着是“连带化功能”的叙事。这是话者作为特定团体的成员，叙述团体中共同拥有的经验，强化和团体的联系和连带感。这种叙述主要在学校的同学会、俱乐部的聚会、退役军人的聚会等持续性的团体中进行。如“就像3年前大家一起庆祝时那样……”“就像我们一起在比赛中获胜那样……”，常采用“就像大家一起经历的某个历史一样(Wie-wir-Geschichte)”的形式，通过叙述团体取得胜利、突破难关或者失去了什么共同经验，话者强化了连带意识，再度确认了在团体内的归属感。另外，有时嘲弄、轻蔑团体特定成员或团体的敌对者也能加强连带意识。这时就会出现类似于传统体裁的笑话的形式(ebd.:211)。再者，反复地叙述团体内的特定个人，会在团体内形成为团体成员所共有的类似个人轶事性的，或者跟特定场所有关的场所传说(Ortssage)这种传承故事(ebd.:213)。

与个别化功能、连带化功能一样，常出现在日常的叙事中的还有“镇痛功能”。这个分析概念来源于医学用语，就像用药物缓解疼痛一样，话者在面对艰难的人生现实的时候，通过讲述达到缓和痛苦的效果。这种叙事有两个类别，一个是话者将自己消极的经验重新解释，通过修正事实，将经验中的痛苦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看待；另一个是通过叙述同胞的不幸命运，给予自己忍耐人生痛苦的力量(ibiid.:213)。例如，因在职场中处于不公正的地位而十分恼火的话者，讲述其克服与上司的矛盾，最后赢了上司的事情。这种叙事对于话者来讲便具有镇痛的效果。另外，在这种叙事的场合有一个共同需要遵守的守则，那就是听者不能发问去确认话者所说是否为事实(ebd.:213-214)。

雷曼在以上三种叙事功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功能，那便是“正当化的话”。

个人在反思或解释自己的人生经验时常常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经验或不想告诉别人的事。当必须要一五一十地叙述这些事的时候，话者就需要以一种听者能够接受的形式去叙述。特别是当这件事或行为违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话，就必须要对与此相关的自己进行正当化，否则就会陷入自我认同的危机之中。雷曼在收集汉堡的劳动者的生活史时，话者不可避免地需要讲述纳粹政权下和纳粹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雷曼发现了这种叙事的功能和叙事的类型。战后，有人因为和纳粹的关系被一般社会排除或产生了世代间的隔阂。所以在叙述自己的过去时，如何叙述身处纳粹世代的自己是

普通人的叙事的日常中很重要的课题。有人保持沉默，有人则将不想触碰的过去作为“正当化的话”进行叙述。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正当化的叙述的例子。

【事例2】

直到现在，最后一学年的事情我都历历在目。那是1930年，当时，我家附近住着一位家具工匠，现在可能已经搬到泽克站了吧，当时失业了！我的父亲也失业了，不得不去农家帮忙。

男人们当时都徘徊在街头不知将来要怎么办才好。我的哥哥找不到教职，也常常去农家帮忙。这时，城里也开始变得政局动荡不安，帝国的旗帜、共产主义者的、纳粹的！实在是糟糕的时代。所以我在1933年时就这么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

在学校，不说年轻的老师了，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师，现在怎么样了？(Lehmann 1980.:207)

在这段话中，话者D是汉堡市一家船厂的店铺修理工。这是在他和雷曼的对话中收录的。D在说这个话题前，先说明了自己身处于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传统之中，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后才讲出了自己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事情。以这个叙述顺序，D强调了加入纳粹组织的抉择是因为政局的动荡不安，在社会陷入穷困状态下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这里便用到了正当化的理论。这种将不合时宜的事实通过正当化的理论变得合理化的叙述也常常出现在叙述自己经验的叙述中。

雷曼将以上这种将叙述的功能放入话者、听者所处的历史、社会语境中进行解读的分析方法更进一步发展，与分析话者和听者所持有的意识相联系，提出了“意识分析(Bewusstseinsanalyse)”的研究方法。

作为意识分析的叙事研究与从前民间故事研究所采用的那种将话者置于故事外部只分析故事文本的方法完全不同。另外，也和关注在不同情形下话者的发言行为的表演研究在研究方向上有所不同。雷曼的分析对象不是客体化或对象化了的文本或作为行为的叙事本身，而是话者的主观性。也就是说，意识分析需要考察在叙事中呈现出的话者的日常性的思考模式、意识以及对世界的解释。另外，这种主观性有时也超越话者个人的意识，成为一种集体意识，也就是现象学所说的间主观性的特点。雷曼的意识分析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为人们的意识总是会以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叙事而表现出来。对于雷曼而言，“作为意识分析的叙事研究的实践，即是发现日常中叙事的法则和体裁，并将之正确地记述，并且放入语境之中进行分析，给予这些叙事以名称，然后分析它们对个人与集团而言在功能上的意义”(Lehmann 2001=2010:47，部分重译)。以往的故事研究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是传承下来的叙事，而忽视了话者的意识以及包含话者的共同体的意识。

4 《叙述经验》——作为意识分析的叙事研究

雷曼把他有关叙事的研究在《叙述经验(Reden über Erfahrung)》这部著作中做了理论的梳理和总结。这本书与其说是收集“日常的叙事”的事例，把“叙事的日常”用民族志的方式记录下来，不如说是对“叙事”本身的思考，他试图展示民俗学性的叙述学的完整面貌。

雷曼认为“叙事”是人的本性，他从Kurt Ranke所用的“Homo Narrans”这一术语出发，不同于作为“被叙述事物”的文本论，而是对“叙事”行为本身以及意识内容被语言化的过程以及语境进行详细地论述。雷曼在日常的叙事研究中反复强调，传承故事与日常中的叙事最大的区别就是，日常的叙事中很多讲述的都是“经验(Erfahrung)”。正如雷曼在著作的开头这么说道：“我们的所有叙述都

在描述经验，同时经验也通过叙事进行传递”（Lehmann 2007:9），我们在日常的交流之中所叙述的都是有关“经验”或者源于“经验”的内容。

这里就产生有一个疑问：经验是如何形成的呢？个人的经验原则上来源于个人的生活史、时代精神（Zeitgeist）的见解、或者夹杂了幻想的印象的巨大集合体（ebd. 35）。通过回想这诸多的经验便有了有关经验的叙事。以往的民俗学的故事研究的学者也表示，包括传统体裁在内的很多叙事都受到多种媒体的影响。雷曼以经验为理念，区分了“一手经验”和“二手经验”。但实际上，不管是个人的经验，还是书籍、报纸、杂志、网络文本等的文字媒体，抑或照片、旅行手册、带照片的游记、电影、电视节目等的视觉体验都作为经历交织在一起，我们很难单以叙事的文本区别一手经验和二手经验。另外，因为经验是由直接经历和通过媒体等获得的二手经验在历史的过程中相互重叠而形成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经验具有历史性。

雷曼认为，文化学意识分析的中心课题便是分析人们日常的意识如何理解生活史中的每一个事实成分并将其重新组合。另外，由于在生活史中，叙事表现出来的经验有着很多不同的来源且复杂地交错在一起，因此，分析它们对意识产生的各种影响便成为“经验的话题（Erzählugeschichte）”研究的中心课题（ebd.:43）。

另外，雷曼除了重视叙述经验的形成过程，也非常重视叙述发生的场合，即叙事的场景。尤其是决定叙事性质的重要原因之一——场景的气氛（Atmosphäre）。

以往的叙事研究虽然也提到了“场景的气氛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和身体的状态”（ebd.:69），但是没有就气氛对叙事的社会场景以及对主观的生活经验层面产生的影响做充分的考察。尽管“气氛是一种主观的体验”（ebd.:69），但“气氛往往是超越个人的，属于文化的一部分。人们通过声音、味道、视觉的印象体验气氛，体验到一种事先给予的模式，最终气氛在这个平台上以语言的形式得以传达”（ebd.:69-70）。并且，通过主观的回想，气氛被复原，并被长时间保存在文本中。因此，叙事研究者可以从叙事文本中提炼出叙事场合的气氛。另外，叙事场合中的物、人、以及空间、景观都在构成叙事的气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者需要从叙事中逐一解读形成该叙事场合气氛的各种要素，同时研究者作为听者也共享着叙事场合的气氛，并需要对此做记录。

5 叙事场景和研究领域

在讨论了叙事分析中气氛的重要性后，雷曼提出了几个具体的研究领域。

心情或气氛会在微观层面影响实际叙事场合的语境，同时，它也会在宏观层面，即大历史中影响了叙事文化的形成。这一点最显著地体现在战时的叙事上。在战时，“流言（Gerüchte）”不仅是“人们叙事的选项，同时也是政治宣传单的源动力和内容。这两个信息系统的相互作用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这成为了批判性的日常的叙事文化的一部分”（ebd. :100）。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纳粹的统治下，流言被统治者作为与国民进行交流的替代系统，成为其窥察国民感情（Volksstimmung）的信息源。警察们积极地出入酒吧、市巷的公共场所收集包含流言在内的“日常的叙事”。例如，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在柏林有着如下的观察记录。

“3月18日，在托雷普塔公园，一位年长的女性看着燃烧的房子说：要是这样战争都不能结束的话，还会发生多么糟糕的事！——别的女性：这场杀戮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战争不能尽早结束？”

“是小道消息吧？在奥古斯滕伯格广场（柏林北部）地区观察到以下情况：2、3个用购物袋武

装起来的女性在别的地方聚集在另一个女性周围, 这名女性似乎悄悄地向她们做出了些什么指示。当监视者经过的时候, 她们明显沉默了下来。这种小团体常常聚集在同一个女性周围, 数分钟后又散开了。似乎是一个什么小道消息的集散地。”
(ebd.:105)

第一则事例与其说是流言, 不如说是一则短暂的见闻。在败色渐浓的德国, 战火中的女性表现出了厌世的心情, 她们渴望战争结束的愿望仿佛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位见闻报告者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战火下柏林的气氛, 但是却能很好地传达了出来。

第二则事例是已经出现在1930年大都市的纪录电影中的情景, 雷曼指出这个场景的记录者很可能受到了电影的影响。且不论这位报告者是否受到了媒体的影响, 女性聚集在共同场所交换信息的情景, 可以看做是一种战时的叙事的日常的景观(Landschaft)⁵。这两则事例都如实地反映出了人们在信息被限制管理的历史状况下, 进行叙事或发言时的日常的气氛。

对于战时的叙事, 雷曼还分析了一些别的例子, 比如: 在电影幕间上映的新闻电影“周刊新闻(Wochenschau)”(它有着形成战时心情和气氛的作用), 有关德国和英国间城市空袭“报复(Vergeltung)”的叙事(为什么我们市民会遭受到空袭?), 有关敌国士兵、俘虏以及占领地原住民等的“有关敌人的叙事(Erzählen über Feinde)”, 还有可以理解为传统英雄传说延长线上的希特勒神话等。

如此,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雷曼的意识分析的叙事研究, 比起叙述的文本, 更看重语境的定性分析。《叙述经验》书中很少提及日常的叙事的文本本身, 而是仔细地描述了叙事的场所所形成的心情、气氛、社会语境、历史状况等, 讨论其理论和方法论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雷曼想要建立的叙事研究是建立在叙事文本之上, 对文本和语境彼岸的日常意识的分析。

结语

雷曼的《叙述经验》的德文标题是Reden über Erfahrung, 他没有用一半用来表示“叙事”的单词Erzählen或Narrativ。在德语里, reden的含义比起“叙事”, 指更为宽泛的说话、发言的意思。鲍辛格在提出“日常的叙事”后, 故事研究者们把日常的叙事放在传统体裁的延长线上作为一种文艺研究。与他们不同, 雷曼把“日常的叙事”扩展为日常中发话行为的总体, 所以用了reden一词。

正如雷曼所言: “若是细心的民俗学者便知道, 原本‘文艺(Dichtung)’(译者: 民间故事)就具有‘本来应属于的场所’, 另外, 只要是通过口头传承, 就必须和非诗性的日常生活相结合。日常的这种非诗性的叙事, 或者说自己人生的叙事成为叙事研究的领域后, 经验性的文化分析将是我们研究领域的中心”(ebd.:224), 很多情况下, “日常的叙事”都不是文学性(文艺性)的。所以与其要从民俗学的叙事研究中找出文艺性的成分, 不如直观地看待“叙事”这种日常的活动或者说叙事文化。并在此基础之上, 通过叙事去了解我们日常的意识。以往的民俗学谈论起传承时总是将无意识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 而日常的叙事这种活动不管是一手的还是二手的, 都是一种将其意识化并语言化的过程。雷曼主张的意识分析正是从传承文化的故事研究向“日常学”转变的一次宣言。

注释

- 1 即便在现代，传统体裁中的传说(Sage)也仍然出现在日常的叙述之中，可以说仍是一种活着的体裁。如现代故事研究者关注现代传说(Moderne Sage)，现代传说故事(Sagenhafte Geschichte von heute)(Vgl. Brednich 1990)。雷曼的《叙述经验》也把传说作为研究领域之一，讨论了战时的“现代神话、传说的形成”(Lehmann 2007:127ff.)。
- 2 Brinkmann在其出生地西发里亚州的奥贝伦贝克尔亲自进入叙事的场所，让助手悄悄记下那里发生的叙事。这个民族志式的研究先于雷曼做的劳动者村的叙事的民族志(Lehmann 1976)，但是他主要关注的是作为社会共同体共有财产的故事，即民俗，他记录下来的叙事也基本上都能被划归到传统的传说或笑话中。不过也包含可以归类为鲍辛格所说的“日常的叙事”中的内容(Brinkmann 1933)。
- 3 将日常的叙事的状况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说明的研究，有必要提及Rudolf Schenda的《口耳相传(Vom Mund zu Ohr)》。Schenda在这本书中指出，日常的叙事的场合中往往会叙述“非日常”的事情(Schenda 1993:49)。
- 4 成为雷曼收集传记叙事资料契机的项目有：“劳动者的生活”“战争俘虏”“难民的故事”“作为生活的关键词的森林”“作为人的记录性的、传记性的技术”等。通过这些项目，雷曼收集到了从各种不同的经验层面着眼的传记叙事的集合，这也成为汉堡大学“日常的叙事资料库”的基础。雷曼指出，在日常的交流的场合中，常常会出现讲述有关电视的话题的情形，但是这种叙事一般持续的时间都很短，很快就转变成围绕这个话题的自身的经历(Lehmann 1976:86)。
- 5 风景或者景观(Landschaft)在雷曼的意识分析研究中是重要的要素。风景在发挥构成叙事场合的气氛的作用的同时，在日常的叙事中，风景本身也常常会成为叙事的对象。雷曼在专著《人和森林(Von Menschen und Bäumen)》中，也考察了人们对作为景观的森林所拥有的意识。

参考文献

- 岩本通弥・法橋量・川祥平編，2011，『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と<語り>のアーカイブ化に向けてー文化人類学・社会学・歴史学との対話ー』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グローバル研究センター。
- 竹原威滋，1985，「ヨーロッパの世間話」『昔話ー研究と資料14号 昔話と世間話』三弥生書店，83-97。
- ダンデス，アラン他著，荒木博之编译，1994，『フォークロアの理論 歴史地理の方法を越えて』法政大学出版社。
- 法橋量，1994，「現代の歴史伝説ードイツにおける第2次大戦についての噂と伝説」『世間話研究』6，20-29。
- ，1999，「体験と「日常の語り」-日独「世間話」研究に関する覚書」『世間話研究』9，102-113。
- ，2010，「現代ドイツ民俗学のブルーリズムー越境する文化科学への展開」『日本民俗学』263,5-30。
- Bausinger, Hermann, 1977, “Alltägliches Erzählen,” *Enzyklopädie des Märchens*, 1, Sp.323-330。
- ，1980, *Formen der Volkspoesie*, Berlin: Erich Schmidt Verlag。
- ，1986, *Volkskultur in der technischen Welt*, Frankfurt/M., New York: Campus Verlag。
- Brednich, Rolf Wilhelm, 1988, “Quellen und Methoden” Brednich, Rolf.W.(Hrg.)*Grundriss der Volkskunde. Einführung in die Forschungsfelder der Europäischen Ethnologie*, Berlin:Dietrich Reimer, 353-380。
- ，1990, *Die Spinne in der Yucca-Palme: sagenhafte Geschichten von heute*, München: C.H.Beck(=1992, 池田香代子・真田健司訳「悪魔のほくろーヨーロッパの現代伝説」白水社)
- ，2001, “Methoden der Erzählforschung”, Göttisch, Silke und Albrecht Lehmann(Hrg.)*Methoden der Volkskunde*,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57-77
- Brinkmann, Otto, 1933, *Das Erzählen in einer Dorfgemeinschaft*, Münster: Verlag der Aschendorfschen Verlagsbuchhandlung。
- Lehmann, Albrecht, 1976, *Das Leben in einem Arbeiterdorf*,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Verlag。
- ，1978, “Erzählen eigener Erlebnisse im Alltag” *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 74:198-215。
- ，1980, “Rechtfertigungsgeschichten.Über eine Funktion des Erzählens eigenen Erlebnisse im Alltag,” *Fabula*, 21:56-69。
- ，1983, *Erzählstruktur und Lebenslauf. Autobiographische Untersuchungen*. Frankfurt/M.,New York: Campus Verlag。
- ，1986, *Gefangenschaft und Heimkehr. 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in der Sowjetunion.*,München: Verlag C.H.Beck。

- , 1999, *Von Menschen und Bäumen. Die Deutschen und ihr Wald*, Hamburg: Rowohlt(=2005, 識名喜善・大淵知直訳, 『森のフォークロア—ドイツ人の自然観と森林文化』法政大学出版局)
- , 2001, *Bewusstseinsanalyse*, Götsch, Silke und Albrecht Lehmann(Hrg.)*Methoden der Volkskunde*,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33-250.(2010, 及川祥平訳「意識分析—民俗学の方法—」『日本民俗学』, 263, 31-56)
- , 2007, *Reden über Erfahrung.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Bewusstseinsanalyse des Erzählens*,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 Neumann, Siegfried, 1967, “Arbeitserinnerungen als Erzählinhalt” Heilfurth, Gerhard, Weber-Kellermann, Ingeborg(Hrg.) *Arbeit und Volksleben*. Göttingen: Verlag O. Schwartz et Co, 274-284.
- , 1980, “Lebendige Erzählen in der Gegenwart. Befunde und Probleme” Jacobeit, W. Und P. Nedo(Hrg.) *Probleme und Methoden volkskundlicher Gegenwartforschung*, Berlin: Akademischer Verlag, 157-167.
- Schenda, Rudolf, 1993, *Von Mund zu Ohr. Bausteine zu einer Kulturgeschichte volkstümlichen Erzählens in Europa*,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Uffer, Leza, 1983, “Von den letzten Erzählgemeinschaften in Mitteleuropa” , Wehse, Rainer(Hrg.) *Märchenerzähler—Erzählgemeinschaft*. Kassel: Erich Röth-Verlag, 21-29.